

翩翩一翰林

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之考察
王云松／著



作者简介

王云松,江苏扬州人,1975年生,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教师、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社会文化史。

翩翩一翰林

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之考察
王云松／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翩翩一翰林：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之考察 / 王云松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75-4130-4

I. ①翩…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前期
②文化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IV. ①D691.2②K24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4998 号

翩翩一翰林：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之考察

著 者：王云松

责任编辑：李瑞虹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ubs.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2.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75-4130-4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一个中央官僚机构，也一直是代表着儒家文化传统和中原封建政权特色的典型官僚机构。自唐宋以来，历朝均曾相沿设置，迭经兴革损益，降及明清，所谓的“词林馆制”已趋成熟。尤其到了以集历代政治制度之大成而著称史册的清代，翰林院及其相关制度不仅“官制大备”，而且更因其政权性质的独特性而较前代更具特色：首先，清初（顺康年间）翰林院的命运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次，以“论纂文史”固为其本职所系，它与清代、尤其是京城社会文化的发展自然关系甚重、密不可分；此外，撇开其“论纂文史”的表面职掌而外，翰林官本身以及由翰林出身的官僚群体在有清一代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构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朝局时政及社会秩序重建、政府文化工程等重要方面地位之崇、影响之巨，令人瞩目。

然而，长期以来，清史学界对翰林院一直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较之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理藩院等机构，有关清代翰林院和翰林群体的研究成果可谓寥若晨星、几近空白。这种研究现状，与翰林院机构、翰林官群体及其相

关制度在清代历史上的真实历史地位与影响，尤其是翰林与清初社会文化的密切而重要的关系，是极不相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点认识，促成了本选题的酝酿确定以及此书的最终问世。

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见于著录的专论清代翰林与翰林院的文章非常有限；而涉及翰林院的相关专著则有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和李鹏年等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二书虽均有专节加以论述，但因全书定位于对清代各中央国家机关的全面介绍，所以对于翰林院这一个具体机构很难也不太可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除此之外，由于历史上翰林院自身形成的大量文书档案几乎已完全毁于清末战火，以致今日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翰林院全宗》中仅有寥寥数件档案，几乎没有利用价值。缺乏直接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相关资料只能通过大量查阅清代官修政书、实录、人物传记、时人笔记文集等来搜集整理，具有一定难度。这可能也是导致关于翰林与翰林院的专题研究相对薄弱之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邸永君所著《清代翰林院制度》一书：该书是长期以来第一部关于清代翰林院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这一专题方面长期以来的研究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书中对于有清一代的翰林院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从制度的源流考辨、机构的建置职掌、官员的选拔考核等诸多方面作了详尽论述，揭示了清代翰林与翰林院在政治与文化领域所发挥的重要功能。这些给予本课题的研究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将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具体确定为以清初亦即是顺治、康熙年间的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为主，因为顺康年间、尤其康熙朝是有清一代许多重要典章制度和职官机构趋于成熟、稳定的重要时期，翰林院及其相关制度亦不例外。本课题所取资料，以清代官修政书为主，主要有乾隆、光绪《会典》及其则例、事例，《历代职官表》，《词林典故》等，参用《实录》、《起居注》及档案资料，旁及时人文集和一些侧重于记载典章制度的清人笔记，力求详确完备。

本书主体部分的主要框架结构是在详细阐述了自关外时代以来的制度沿革、

“清承明制”之与翰林院设置、清初翰林院体制等制度问题之后，着眼于当时的特殊时代前提，将翰林院置于清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的满汉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着重论述它通过经筵日讲和侍直南斋（即南书房）两大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以及它在社会秩序重建、学术文化和康熙朝政府文化工程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社会文化职能，最终揭示出清初翰林与翰林院掩盖在其“论纂文史”的表面职掌之下、鲜为人知的“卿相之摇篮，人文之渊薮”的真实历史地位。至于妥当与否，尚祈方家指教。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绪论 / 1

前引：明清之际的政治氛围与社会文化背景 / 1

第一章 明末清初传统社会的异变：由江南以观全国 / 3

第一节 暗潮涌动：另一个视角看晚明江南社会 / 3

第二节 清初江南社会反正统潮流探析 / 34

第二章 清初帝王的政治抉择与为政理念：以康熙为例的考察 / 67

第一节 浅析康熙帝的吏治思想与为政之道 / 67

第二节 文治与文制：康熙朝盛世治绩的两面性 / 72

正编：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以翰林院为中心的考察 / 95

第三章 清初翰林院及其相关制度研究 / 97

第一节 明代词垣述略 / 98

第二节 清初翰林院设置沿革 / 101

第三节 清初翰林院概述 / 107

第四章 翰林院与清初政治 / 119

第一节 “清承明制”：对明代词林之制的继承与发展 / 120

第二节 具有清朝特色的制度创新 / 123

第五章 翰林院与清初社会文化 / 135

第一节 翰林与清初社会秩序重建 / 136

第二节 翰林与清初学术文化 / 138

第三节 翰林与政府文化工程 / 146

余论：清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的翰林人生 / 155

第六章 清初翰苑名流之个案述略 / 157

第一节 康熙文坛双雄——“南朱北王” / 157

第二节 江淮直臣——乔莱 / 161

第三节 “半生诗酒客”——“江左十五子”顾嗣立的洒脱人生 / 175

前引：

明清之际的政治氛围与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章 明末清初传统社会的异变： 由江南以观全国

第一节 暗潮涌动：另一个视角看晚明江南社会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明清时代的江南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走在全国前列的最先进地区，于是众多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研究重点投放到了这里。毋庸置疑，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江南地区是最为耀眼的一个亮点，是明清传统社会机体中最具经济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部分：工商业的高度发展，不仅萌生并发展了前所未有的蕴含资本主义因素的新生产关系，而且产生了与之密切相连的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从晚明时代开始，种种“离经叛道”、乃至惊世骇俗的反正统观念与新异生活方式在江南社会蓬勃兴起，蔚成风气。我们不妨以此为视角，来透视一个表面繁荣富庶、歌舞升平实则暗潮涌动的晚明江南社会；并由此进而探知明末清初的传统社会相对于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正统藩篱

而言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

一、晚明江南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一）新兴市民阶层现身历史舞台

随着包含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因素的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城市的普遍繁荣，晚明江南地区的阶级关系也随之悄然变化：新兴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点，不仅国内学者多有论及，国外学者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著名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指出：“在国家有意无意地放松监督的时候，如十六世纪末期，中国曾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经历一阵经营工商业的热情。在北京附近的大规模冶铁工场，景德镇发达的瓷器工场，尤其在江苏省会苏州蓬勃兴起的丝织工场里，我们看到这个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不过这股热情为时甚短。满人征服中国后，这场危机将在十七世纪以不利于城市自由的方式得到解决。”^①“中国拥有牢固的市场经济，我们已多次谈到，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往来繁忙。可见，基层经济活动十分活跃，贸易也很兴旺，政府也有意扶植，虽然在它看来，农业收成才是一切的根本。但国家机器仍高高在上地监视一切，它对富得异乎寻常的任何人都持明显的敌对态度。在中国，城市附近的土地被课以重税（在欧洲，城里人出高价买下这些土地，借以获得丰厚的收益和地租），从而抵消因靠近城市市场而具有的优越地位。可见，除了由国家撑腰、监督 and 控制的特定商人集团（如十三世纪的盐商或广州的‘公行’）外，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至多可以说，明代存在着一个市民阶级。”^②美国学者玛丽·兰金也认为，中国在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晚明时代已经出现了公共领域，而且当时“还有其他公众示威，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初期更加相像，包括城市政治辩论、学者对独裁政治和官僚体制的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 623 页，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

②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 654、655 页，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

批评，以及与东林书院和复社相联系的文人学士圈子中的改良主义议论”，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与西方极其相似的市民社会的雏形。“晚明时期这个领域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而且也反映出国家和经济缺乏周期性的变化。它的背景在于众所周知的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①

新兴市民阶层初登历史舞台不久，便向腐朽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接连发起冲击，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晚明江南发生的一系列“民变”便是声势浩大、举国震动的市民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当数苏州的万历民变：“万历二十九年，织造太监孙隆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集众徐元、顾云、钱大、陆满等二千余人，推昆山人葛成为首，分作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先从葑门起，于觅渡桥捶毙王（黄）建节，午间又毙徐怡春。长洲知县邓云霄，先擒委官头目汤辛、徐成下狱，众忿不息，昼夜不辍。至七日又拥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莫皂隶及孙顾等十家，毁其室庐，毙其戚属。云霄见势汹涌，再械辛、成二凶于圆妙观，众殴立死，裂其尸。吴县知县孟习礼，以利害晓示，众指为阉党，转逼隆署。隆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八日，又言诸税官从东城巨室，贷金营委，各执炬焚其居第。知府朱爕元，偕推官朱一龙，以恩义劝谕，始解散。兵备按察使邹墀，自太仓闻变驰至，檄捕首从。葛成等欣然就狱，受绑笞无悔。”^②

时任应天巡抚的曹时聘在其奏疏中也对这次民变有比较详实客观的记载：“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孙隆在吴日久，习知民情，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止榷行商，不征坐贾，一时民心始定。然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原奏参随，本地光棍，以榷征为奇货，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加以大水无麦，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人路矣。五月初旬，隆入苏会议五关之税，额数不

① 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199页。

② 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卷十二，《杂记》。

敷，暂借库银那（挪）解。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光棍汤莘、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税，擅自加增，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一呼响应，毙黄建节于乱石之下，付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而乡宦丁元复家亦与焉。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同里，防其沿烧。殴杀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① 曹时聘实际上委婉地指出了万历苏州民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织造太监孙隆滥用恶棍、横征暴敛，肆意摧残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苏州丝织业以及商业，因此，从性质上来说，万历苏州民变是一次以城市手工业工人为主力的、反对封建暴政的市民暴动。

（二）传统社会关系的嬗变：以士人阶层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松江籍官僚文人何良俊曾说：正德、嘉靖以来的四五十年间，地方上由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② 何氏之言道出了晚明江南社会不同于前的显著变化：“舍本逐末”之风愈演愈烈，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生产中去，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给社会带来的冲击。

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对金钱财富的渴求促使人们对长期以来被斥为“末业”的工商业另眼相看，商人及商业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贵农贱商，故赋倍于农。自汉武帝用弘羊计，置均输官，笼天下之货，贵卖贱买，商贾无所牟其利，而物价悉平，名曰平准。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宦为吏，重赋税以困辱之。自后作业剧而财匮，匈奴数侵边，屯戍者多，边粟不给。于是募民输粟塞上，得拜爵除罪，复弛商贾之律，令佐国家之急。而贾人愈富，国用愈不足。乃用卜式，下缗钱令，用张汤、杜周腹诽法，以税民深者为明吏，自是商贾中人之家大率破产入官，不事蓄藏，而贾人亦大困矣。”历史上商业和商人的境况于此可见一斑。明朝初年，还是遵奉历代以来的“重本抑末”政策，而且“关市之禁视前代尤详。舟车掌于钞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巡抚应天右金都御史曹时聘疏。

^②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关，为司徒属。竹木掌于抽分，为司空属。盐课有转运，有提举，而又有御史稽察之；茶课亦然。余皆领于司徒。即征商之法，纤悉具备已。”^①然而到了晚明，商人由于财力雄厚，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商人们甚至有些志满意得、趾高气扬的味道：“然而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飞尘降天，赭汗如雨。僮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携箏琴，长袂利屣，争妍而取容。彼且矜夸智能，足以自便，意笼宇宙之化工，计穷人物之变态，与时俯仰，举材货低昂，在吾掌握中，持筹而算，百不失一，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社会关系的嬗变也就势所必然。自古以来士、商之间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体统悬绝”的坚冰开始消融，士可为商、商可为士，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被打破了：“苏之昆山有节庵方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③弃儒从商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之事：“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④特别是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居于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做出了何种回应则尤为引人瞩目。

对于晚明江南士人阶层出现的种种变化，当时人以其亲身经历之故而感触颇深，如松江范濂说：

士风之弊，始于万历十五年后。迹其行事，大都意气所激，而未尝有穷凶极恶存乎其间；且不独松江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苏州，则同心而仇凌尚书；嘉兴，同心而讪万通判；长州（洲），则同心而抗江大尹；镇江，则同心而辱高同知；松江，则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

①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②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③ 《王阳明全集》，卷二五，《外集七》，《节庵方公麟墓表》。

④ 《履园丛话》，卷二十四，《杂记下·孙春阳》。

道之一变也。

第吾松江，近来士子举措互有得失，识者不无异议耳。姑举一二言之：如东乡富民费仲扛打生员陆龙基，西乡富民马可观扛打生员刘致和，此以强暴凌孤寒诸生，声之有司，从重问遣，何壮也！间有无耻之徒，捏情需索，则陋矣；县学前旧有七星潭，徐司空盛时，侵为基。诸生建议拆卸，开复故址，何正也！乃指徐氏为奇货，若欲并其三第而去之，则苛矣；牛市泾风水，有关学校，诸生议开浚，亦理也。但此泾历乡宦冯、季、陆、徐，皆有侵塞，独委罪于监生陈大廷，不能无意。况其第属主政殷廷枢，议遂寝，则馁矣；县学旧属莫是鳌修，未几圯坏之。属监生顾正伦修，诸生督过之者甚众，恐其蹈莫之弊也。正伦殚力改造，宛如创始，遂至倾家，而学前空地，责令插屏种花，亦苛矣；保留詹侯项令，不惮千里，奔赴两台，此以子弟而保留公祖父母，虽涉攀附，情可原也。但未及半月，又往公举徐文贞公祠，遂为督抚刘公、按院甘公所不满，含垢忍耻而归，则丑矣。凡此皆缘人品贤不肖，参错其间，故有一义举，则生一恶道，士风之所以日习于不竞也。

但士之所在清苦，其势不得不流而为近利；所望在进取，其心不得不趋而为好名。不知近利好名，正今之士人对病药石也。先民有曰：“善不可为”，又曰：“善且不可为”，而况于恶乎？此万世之龟鉴也。嗟嗟！世道愈漓，法网愈密，亦可畏矣！吾愿同心之士，日以中原之诗相勸焉，其庶乎无忝于衣冠也哉！^①

从范氏的记述可以看出，晚明江南的士人阶层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下，由重名节、慎行止转而趋于近利好名已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发生了种种明显异变：其中一部分人素行不端，寡廉鲜耻，沦为人品卑污的士林败类；更多的人则紧密团结为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为了乡土利益而与统治阶级进行有力的对抗，并且往往如愿以偿，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这是以前时代闻所未闻之事，故被范氏视之为“人心世道之一变”。

^① 《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